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六二五期 ——  
(二〇〇八年一月二十三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801f)

---

【本刊专稿】	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司马清扬
【专题访谈】	林彪百年后，评价重开头 ——多维专访《百年林彪》主编丁凯文	庐仔钱 丁凯文
【人物春秋】	百年回首话林彪	沙叶新
【回首人生】	我和徐景贤	冯友兰
【回首文革】	冯友兰忆江青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本刊专稿】

试论文革初期周恩来与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

• 司马清扬 •

中央文革小组前身是“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其成员名单是在周恩来参加的并由邓小平主持，在1966年4月9日至12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的。(1)但是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伊始，并没有人给以太多重视，且在中央文革小组许多成员观念中，它就是政治局常委的参谋秘书班子，甚至是归刘少奇、邓小平领导。(2)但是后来经过毛泽东和江青的诸多运作，中央文革小组最终成为“文化大革命”的指挥机构和其成员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主要成员以及人所共知的中央首长(中央文革小组主要骨干力量)。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历史的变迁中，周恩来的作用始终被官方漠视甚至所不承认。本文将对周恩来在中央文革小组以及江青的“高迁”中所起到的作用作一个简单交代，并对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作一简单探讨。

一、周恩来对江青的吹捧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大力支持

首先，周恩来在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上不遗余力。为了树立中央文革小组的权威，毛泽东在7月24号发话：“中央好多部，没有做多少好事，文革小组却做了不少好事，名声很大。”〔3〕继而在紧接着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进而称赞：前一时期正确的是中央文革，而不是中央。〔4〕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列席会议并在同期举行的批刘（少奇）邓（小平）政治局生活会上充当了主力军。在此大背景之下，周恩来对此是心领神会，亦步亦趋。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等人时就指出：“部的名称太大，过去文化部那么大，干了不少坏事，今天中央文革小组，是一个小组，到做了不少好事，很受群众欢迎。”〔5〕

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第一次接见红卫兵。由周恩来亲自审定的关于此次接见的新华社电讯稿刊登于次日的《人民日报》。〔6〕该通讯称：“有1500名学生代表登上天安门城楼，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起参加大会。毛主席和林彪、周恩来、江青等同志分批地接见了他们，同他们谈了话，并且在一起照了相。”“庆祝大会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陈伯达同志主持。他在致开会词时说：‘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7〕在此新华社电讯中，江青被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就如历史已经证明的那般，江青高于其他政治局常委的地位呼之欲出。陈伯达也被单独点出，对于这个中央文革小组组长给予了非凡的待遇。对于周恩来插手此类排名事件，并不是只有这么一次。王力回忆到：1967年的5月1日，周恩来把已经印好的《人民日报》停发，把原本排名排在中央委员名单之后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提到中央委员名单之前。〔8〕

陈伯达在1966年8月因病住院，主动提议由第一副组长江青代理组长。〔9〕笔者认为这本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中共中央却为此专门发出通知：陈伯达同志因病经中央批准休息。在陈伯达同志病假期间或今后离京外出工作期间，他所担任的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由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代理。〔1〕根据当时的组织程序，此类通知是由周恩来主持的中央碰头会提出草拟并报毛泽东批准。此事是周恩来主动为之或是得到毛泽东事先提示尚无可信证据。但是无论如何，现在看来，此举并不是多此一举，而是具有深刻重大的政治历史影响。首先，对于江青在全国树立起其为中央首长的形象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堪比913之后公布的《毛泽东致江青的信》一般，为江青获得了巨大的政治资本（无独有偶，周恩来也为这封信做了背书——笔者注）；其次，为江青把持中央文革作了法律上的背书。正如文革史专家王年一所论述，此通知具有非凡的政治意义。〔11〕实际上，在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际，周恩来提议陈伯达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和后来江青提议徐向前作为全军文革小组组长同出一辙。〔12〕软弱的陈伯达和具有历史包袱的徐向前都可以被轻易作为“刘盆子”使用。陈伯达自己就承认：自己没有能力。〔13〕于是陈伯达推荐康生，但是康生如何能做得了“刘盆子”？周恩来对陈伯达软硬兼施：“你还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分配你的工作？”〔14〕后来发表由江青代理组长则显得极为顺理成章。成为代理组长的第二天即1966年8月31日，江青主持毛泽东第二次接见50万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的大会。大会情况由新华社发布消息：毛主席和林彪“以及贺龙同志”，由谢富治、杨成武陪同乘第一辆汽车，紧跟着周恩来、陶铸、聂荣臻、江青乘坐的第二辆汽车，邓小平、康生、刘少奇、陈毅乘坐的第三辆汽车，朱德、李富春、陈云、董必武乘坐的第四辆汽车，叶剑英、萧华、王任重、刘志坚、张春桥乘坐的第五辆汽车，缓缓绕行天安门广场一周，然后登上天安门城楼。“六时四十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第一副组长江青同志，宣布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开始。江青同志代表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问好。她说，我们热烈地欢迎你们，向你们致革命的敬礼”。〔15〕

国庆节后，陶铸对报纸上关于江青的宣传极其反感：“你（曾志，笔者注）看，这几天的报纸，照片上居然将江青和总理平列，象什么样子？”〔16〕陶铸是常委中主管宣传的，但是是谁越过他插手照片排列之事？舍其周恩来，还能有谁？

10月6日，首都红卫兵“三司”在首都工人体育场发起召开有北京和各地各大专院校师生10万人参加的“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江青讲话之后，周恩来表态：“同学们，革命的红卫兵战士们，我首先向你们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敬礼！我没有更多的话要说了，我完全同意刚才江青同志讲的那段话。她讲的那段话，我们大家都看过，都同意的。后来又请张春桥同志宣读了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那不但是对全军的指示，同样适用于我们大中学校。江青同志的讲话和中央批准的军委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的录音，我们把它制成录音片子，到全国大中学校去放。这样就不仅是今天到会的同学、红卫兵战士都听到，而且是全国大中学校的同学，红卫兵战士原原本本都听到。”（17）把江青在一个大会上的讲话做成录音，在全国播放。江青名闻九州，声震寰宇的地位就是这样被周恩来一手促成。对于一个还不是中央委员的江青，这种待遇即使不是空前，恐怕也是绝后。

其次周恩来除了在宣传江青上十分卖力气，另外还当面奉承当众江青。1966年11月28日晚，北京和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多名“革命文艺战士”，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言：之所以隆重其事，是为了对江青进行一次集中的人为拔高和吹捧，这是一次向江青表忠献媚的大会。（18）

周恩来在此次大会上不顾历史的真实，对江青做了极其露骨的吹捧：“在这里介绍一下，在座的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江青同志，都是坚决拥护和执行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上面所说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支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我在文艺方面是个外行，是个不成功的支持者。在方针上，我是坚持革命化、大众化、战斗化和民族化的，但在实践上，常常犯指导性的错误。例如，在音乐方面，我是外行中的外行，我只强调中西音乐的不同处，强调反对崇洋思想，强调中西音乐分开的基本训练，不认识洋为中用，不认识可以批判地吸收西洋音乐为我所用。在这个问题上，江青同志直接帮助了我，我也在学习革命歌曲的实践中，得到了深刻的体会。”（19）在这场把江青树立为伟大的文艺革命旗手的登基典礼上，周恩来是立了头等功的。

正如余汝信先生所评论：周恩来的讲话，通篇充满了卑躬屈节、谄媚奉承的表白。谁又可以说，在江青迈向更高权力的道路上，没有周恩来推波助澜的一份功劳？（20）诚如历史所记载，周恩来从一个这种表态到当众高举手臂高呼“（我们要）誓死保誓死保卫江青同志！”也就不足为奇了。（21）

## 二、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的由来以及二者之间的摩擦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之后，形如一盘散沙，内部也是矛盾重重。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一员的穆欣称：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内部充满错综复杂的争斗，作为一个共产党的组织，它是我所见到的最无政府、最无章法的地方。（22）甚至中央文革小组每天干什么（比如开什么会，通知什么人参加，接见什么组织等），都是临时决定，办公室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安排停当，工作人员整天忙得团团转。（23）而更为致命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之间芥蒂矛盾非常大。

江青曾经挖苦道：“中央文革小组的会议很难进行，只要康老（笔者注：康生）和陈伯达见面，两个人就吵。陈伯达连（周）总理的话都不听，尽管我告诉他你要听（周总理的话）。周总理做康生的工作，我就做陈伯达的工作，最后会议总算可以举行了。但是时间没过多久，两个人又吵起来了！”（24）毛泽东也抱怨：（同一个事情）康生讲他的，陈伯达告诉的却是另一个，江青也有自己的版本。而且连报告都没有。（25）

陈伯达曾这样回忆：在毛主席第一次检阅红卫兵不久，我生病进医院，江青就当然代理组长职务。毛主席再次检阅红卫兵时，江青致辞，从此，她就在小组中横行跋扈。我向去医院看我的人，提出一些看法，于是大大触怒江青了。当我的病没有好时，江青要关锋去叫我出院。我已晓得这个女人很难对付，决定出院。我撇开江青，找王力、关锋、戚本禹起草一个拟送中央的文件，确定中央文革小组是中央政治局直接领导的工作机构。意思就是：中央文革的言行都要向中央请示，不能擅自作主。这就要使江青受到约束。会议未完，可能有人泄露给江青，江青来了，大闹一番。我现在不记得她要加了一句什么，但她说，“我这句是最重要的。”从此以后，文革小组就没有再单独开会了。毛主席指示：以后开会，由周总理主持，叫中央文革碰头会。（26）根据陈伯达所述笔者推断这是在1966年9月中旬期间。

很明显，在某种程度上中央文革小组实在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周恩来从8月20号左右就开始主持中央碰头会。由此可见，周恩来主持中央文革碰头会完全是因为形势所逼，并非毛泽东的初衷。而且正如文革初期，陈毅所评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是新文革和旧政权的矛盾，说到底，‘文革’第一要打倒刘少奇，第二要打倒周恩来。”（27）。在这种局势下，周恩来自然会遇到所谓的“黑枪”“暗炮”。需要指出的是，周恩来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攻击，出于多方面的原因。既有因为毛泽东的决策导向引诱而成，也有各自利益冲突，自然还有权力之争。决策导向，自然是因虽然毛泽东的在他的大字报中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但是因为还没有彻底打倒刘少奇，作为发动文革借用的最大力量就是周恩来，自然还有其利用价值。但是，这并不代表着基本决策有什么变化。各自的利益冲突，权力之争，在周恩来身上却被演绎成根据“党的原则人民的利益办事”，在其他人身则成了“祸国殃民”“篡夺权力”。这是违背历史基本事实的。

所以在文革初期，周恩来扮演了一个非常微妙的角色。一方面，周恩来要执行毛泽东的“抓革命，促生产”的号召，这也是国务院总理角色的职能；另一方面，周恩来为了不被打倒，这也是其在整个文革中所要达到的目标，无论是“鞠躬尽瘁下地狱”还是“相忍为党”都是为了这个目标，为了死后脸上不被“打叉叉”。所以，周恩来要做一个响当当的文革派，以至于在某些方面做得比中央文革小组还要左。这样，在这两个方面无疑都会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指责。

周恩来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外交部大搞“牛鬼蛇神”，其中含有三名副部级干部王炳南、陈家康、孟用潜，若干司处级干部以及大批一般干部与工人，也分别被打成“牛鬼蛇神”、“小三家村”等，并发生了抄“牛鬼蛇神”们的家的事情。（28）周恩来还在9月份签署了关于国务院系统如何进行文革的《纪要》，该《纪要》提出要把所有干部都放到火里“烧一烧”。此事后来被张春桥告状，说周恩来对此文件评价很好，并以此为胁，周恩来为此多次检讨。张春桥并批评周恩来，打倒所有干部其实是周恩来搞的。（29）此事完全表明，虽然在支持文革的大方向上，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是毛泽东所倚重的两驾马车，但是在某些方面，周恩来比中央文革更左。或许出于争宠，也可能是争夺运动的主导权，二者发生冲突是可以预见的。

除了支持发动文革之外，周恩来还要执行国务院总理的职能，执行毛泽东保人的政策，这和中央文革小组有很大的不同。虽然中央文革小组也保人，但是因为具体的分工不同，冲突自然难免。因此就有了周恩来“调和”“和事佬”等的说法。在1966年10月31日，姚文元在纪念鲁迅30周年的讲话和11月1日的红旗社论都不点名的批评了周恩来，评之为“骑墙派”，谓之“那些标榜走中间道路的人，必然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这是在1966年中央文革小组和周恩来之间最大的一次冲突。原因有二，一是周恩来在参与了一些文件政策的制定，而这些文件并不一定全部符合中央文革小组的意；二是针对于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各级领导对于文革仍然“很不理解，很不认真，很不得力”的中央工作会议的召开。（30）对此，周恩来为了保护自己，在11月起草关于公交系统和农村文革的文件制定中基本上不再参与，而是由陶

铸出面搞。(31)事后,陶铸完全成了周恩来的“挡箭牌”,对于整个陶铸的落难,周恩来没有施加援手。相对于康生,康生还提醒陶铸,进行路线交底。(32)

### 三、周恩来同中央文革小组关系的另一面

周恩来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并不是水火不容,更不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所云“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而是毛泽东手下两大刚柔并济的政治利器。虽然在毛泽东的初始打算中,周恩来也是要被清算的目标之一,但是在没有彻底打到和解决刘少奇的情况下,周恩来仍然具备巨大的利用价值。(33)徐向前回忆到:文化大革命初期,周恩来积极响应和支持毛泽东发动文革。对于那些持有怀疑或者不积极的很多高级干部,周恩来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说和帮助他们加深理解文化大革命的意义、性质、对象和任务。最后徐向前指出,没有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忠心耿耿”,文革是不可能搞起来的。(34)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想象中的“一呼百应”,很多例如李井泉之类的高级干部在一开始就对于毛泽东的“发动文革”很是不理解。个中缘由恐怕是“高岗事件”恍如昨天之事,历史教训不可不吸取,刘少奇经营党务多年,树大根深,难保不再翻天。还有诸如陈毅之类一开始是举双手双脚赞同文革并在自己权力范围之内大搞迫害大揪“牛鬼蛇神”,但是当揪到自己头上就不“理解”的高级干部。此二类高级干部都需要周恩来,这种“屡犯错,屡检讨,保持晚节,终生都要做毛的奴仆”的人,作为活生生的“典范”来说服众人。俗话说“杀鸡给猴看”,周恩来是自己把自己变成了那只“鸡”之外,还要“鸣几声”来告诉众人,“你们不跟着毛主席走,就是自绝于党,自绝于毛主席。”

就整体而言,特别是文革初期,周恩来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基本是十分融洽的。虽然江青倚仗“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对周恩来时有不敬,但是江青对于周恩来并不是后来官方一直认定和宣传的:江青对周恩来是使尽奸计、迫害和炮打。(35)两者的关系可以用周恩来和江青自己的言论作为注脚。江青在接见北航“红旗”,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代表时指出:“反我们的总理……就是指向中央。”(36)周恩来坦言:“有人“想动摇中央,挑拨我和中央文革的关系,这是不会得逞的!我和中央文革是在一起办公的,今晚我们又在一起。”(37)

通过大量的实例,周恩来对于江青可以说是毕恭毕敬。(38)笔者在此无意一一列举。可以用师东兵的话描述周恩来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我是把你当主席一样看待,中央文革(小组)决定的事,我们去执行。(39)对于周恩来如何支持中央文革小组的工作,吴法宪对此有过生动的回忆。1966年10月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重点批判刘少奇的错误路线。但是由于与会的各地干部对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很不理解,所以对于批判刘少奇并不积极,会议开了许多天却效果不彰。经文革小组提议,周恩来亲自给吴法宪下令,由空军派出专机,将各地的造反派头头们接来北京,一起参加讨伐刘少奇的大会。这些造反派头头一到北京,就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批刘斗争。吴法宪回忆说“我们东北组来的是贵州造反派头头,此人一到北京就由中央办公厅派专车接到京西宾馆,神气十足。他来了以后,周恩来亲自到东北组来参加会议,以示重视。他滔滔不绝地一直讲了三个钟头,专门揭发当时贵州省委第一书记周林等人是如何破坏‘文化大革命’,如何镇压学生运动和逮捕红卫兵的情况。我看到,在这个人讲话过程中,周恩来一直在频频点头,赞扬他的揭发。”造反派的与会终于在会上掀起了批刘高潮。(40)可见,经过周恩来的智慧,中央文革小组的一些提议和决定会得到更完美的发挥和更理想的结果。

江青对周恩来也并不都是飞扬跋扈,相反,江青时常对周恩来非常尊重。中央文革碰头会也是由周恩来主持。官方为了树立周恩来的伟大形象,于此点非常忌讳,一概不提。而在穆欣、王力等当事人的回忆中都对此加以证实,而且连中央文革小组的日程都是由周恩来安排。

〔41〕林杰的太太王乃英曾经“交代”：江青经常等周恩来拿主意，虽然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有时候不同意这种做法；林杰抱怨说，江青总是让我们按照周总理的命令去执行，事情总是变的越发困难。〔42〕自然，周恩来也报之以桃李。不仅对江青，连对张春桥都说：你们是管战略的，你们定了，我给你们办。〔43〕

而“臭名昭著”的康生，在1966—1967年的公开场合对于江青都是不卑不亢，无甚吹捧。〔44〕两相对照，黑白分明，谁优谁劣，自然而出。当然，周恩来也并不是没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当王力等动了周恩来的“奶酪”，插手周恩来的“禁脔”之地——外交部之后，周恩来就不再是那只温柔的“羊”。

至于周恩来为什么如此自我“作贱”，是什么重要因素在文革时期制约了周恩来，导致周对江青和文革小组如此这般。笔者认为那就是周恩来对毛泽东一个人的忠心，而非对国家和人民的负责，是周恩来时刻在心里的以所谓“贤相”自居，保持晚节的心态所致，由此周恩来也只能扮演“从恶”和“帮凶”的角色，起到任何其他他人所起不到的作用，而非制止动乱、更不可能拨乱反正，引导国家步入正途。周恩来还可以说是第一个领会到“江就是毛的一条狗”的高级领导人，因此，周恩来对江青的态度之谜也就可以“迎刃而解”。

## 结 论

周恩来和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的关系很大程度上受到毛泽东对周恩来的态度和文革的进展所影响，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是个决定性因素。但是除了这个因素之外，周恩来对于江青的吹捧很大程度是自降人格。而在贯彻毛泽东的意图，把江青以及中央文革小组抬到凌驾于中央政治局之上的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可以说是居功甚伟。

注释：

〔1〕中发〔66〕267号文件附件二《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 转引自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第608期 2007年11月5日

〔2〕沈传宝《中央文革小组的历史沿革及立废原因探析》 《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1期；王力《王力反思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3〕穆欣《关于工作组存废问题》 华夏文摘增刊 第三三八期 二〇〇三年五月五日出版；《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胜利万岁》（编者 佚名，1969年7月），页777 转引自 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4〕同〔2〕

〔5〕《周恩来在1966年9月19日接见科学院文革代表和院党委的讲话》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6〕陈龙《回忆敬爱的周总理对新华社工作的亲切关怀》 人民出版社资料组编《人民的好总理》 1977年版 第247—265页；根据此文中的描述，周恩来对于1966—1974年间重大新华社电讯都是亲自审定（笔者认为只要周恩来在国内具备审阅条件）。虽然陶铸此时主管宣传，但是根据曾志的回忆，陶铸认为江青根本够不上国家领导人的格，也仅仅是能干个文化部副部长的缺，而且陶铸在刚刚结束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对于江青的提议——批刘少奇和邓小平一事根本不与理睬，因此笔者认为陶铸如果没有上层旨意根本无意对此如此般宣传；无独有偶，阎长贵先生在《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一文中也如此质疑：在这篇通讯中，江青不仅被置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行列，而且排位很靠前、很突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是偶然的、无意的，还是按当时新任排名第四的政治局常委、中央宣传部部长陶铸的指示做的？还是有其他利么人授意或安排的？均不得而知。

- (7)《人民日报》1966年8月19日，第一、二版。
- (8)王力《王力反思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 (9)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版 第305页
- (10)《中共中央关于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职务的通知》 1966.08.30；中发〔66〕439号
- (11)王年一《文革漫谈》 原手稿存于哈佛大学
- (12)陈伯达：《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95港：天地图书公司，1998)，页79；宋永毅《一个被掩盖了的文革周恩来形像》；罗冰：〈官方秘密档案披露：周恩来参与批斗刘少奇〉，《争鸣》1999年第3期，页20 笔者注：余汝信先生在其《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一文中对于江青出任第一副组长有不同的解释。
- (13)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版 第268页
- (14)同(12)
- (15)《人民日报》 1966年8月31日，第一版
- (16)曾志《一个革命的幸存者》 广州人民出版社 1999年版 第455页
- (17)《中央首长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周恩来 1966.10.06 宋永毅主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
- (18)余汝信《1966年的中央文革小组》 华夏文摘文革博物馆增刊 第608期 2007年11月5日
- (19)《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首长讲话选编》第四集(首都大专院校赴西南革命造反派编，中国京剧院红色革命人民战斗队翻印，1966年12月)，页60
- (20)同(16)
- (21)《北邮东方红》(北京：北京邮电学院革命委员会，红代会北邮东方红公社主办)，1968年3月29日，第76期第1—4版 1968年3月27日，周恩来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上的十万人“彻底粉碎二月逆流新反扑，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全面胜利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 (22)穆欣《剑拔弩张：中央文革小组实录》《纵横》 2006年第1期
- (23)王广宇《关于中央文革建立下属机构的回忆》《党史博览》 2005年11期
- (24)北京工业学院运动办公室《大字报选编》 北京 1976 第二卷 16页 引自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0
- (25)王力《An Insider's Account of the Culture Revolution》 第40—41页
- (26)叶永烈《陈伯达传》；陈晓农编纂《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 2005年版 第305—306页
- (27)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1年9月第一版 第255页
- (28)马继森《外交部文革纪实》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 (29)王力《王力反思录》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 (30)刘武生《周恩来的晚年岁月》 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
- (31)王力《王力反思录》下册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 (32)权延赤《陶铸在文化大革命中》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年版
- (33)关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以及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详见笔者的另一篇：文革初期的政治格局初探——“三驾马车”替代“两驾马车”
- (34)北京师范大学主编《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第五集》 1978年版 徐向前《鞠躬尽瘁 砥柱中流——回忆周总理在文化大革命的片断》 第1—9页
- (35)具体官方宣称：可参阅 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传》。所有官方在打倒“四人

帮”之后，对于江青在文革中对于周恩来的支持和保护一概不提。

〔36〕武汉造反派编印《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中央负责同志讲话抄录》 第2卷 第137页

〔37〕首都红代会北京第二外语学院红卫兵 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井冈山”主办 《周总理重要讲话》（1967.9.18） 载《外事战报》 1967年9月26日 第2期第1版。

〔38〕具体可参加《吴法宪回忆录》 杨银禄 《江青在钓鱼台居住时的一些情况》 等

〔39〕师东兵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前所未闻的周恩来》2000年3月第1版 33—41页

〔40〕吴法宪 《吴法宪回忆录》

〔41〕穆新 《中共党史资料》 1999年 第69期 第86、88页

〔42〕Macfarquhar Roderick Schoenhals Michael 《Mao's Last Revoluti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p101  
《王乃英交代材料》

〔43〕王力 《王力反思录》下册 香港北星出版社 2001年版 第679页；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

〔44〕阎长贵《文革初期对江青的宣传》《党史博览》 2005年 第1期

#### 【专题访谈】

#### 林彪百年后，评价重开头 ——多维专访《百年林彪》主编丁凯文

• 庐仔钱 •

今年12月5日是林彪的百年诞辰，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由丁凯文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日前丁凯文接受了多维记者的书面采访。

◇ 国内出现不少新的迹象

多维：林彪的百年诞辰纪念日快到了，我们看到明镜出版社出版了这本由您主编的《百年林彪》一书，请你谈谈出版此书的主旨为何？

丁凯文（以下简称丁）：林彪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林彪功罪评价也是中共党史、文革史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课题。林彪的一生起伏跌宕，经历了北伐战争、第一次国共内战、抗日战争、第二次国共内战，为中华民族抗击外敌入侵，为共产党打天下和中共的建国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在中共建国后被封为十大元帅之一。

然而，林彪在其晚年卷入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最后却因反对了毛泽东的“文革”红人张春桥而为毛泽东所不容、所逼迫，在毛泽东准备发起对林彪的党内斗争之时，林彪与毛泽东和平分手、乘机出走，在蒙古温都尔汗不幸罹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三十多年来林彪一直被中共官方丑化、妖魔化，世人对林彪的认识也大都停留在一些表面的现象上，史学界更是缺乏深入、细致的研究，迄今已有的一些书籍、文章，基本上都是按照中共官方的口径，对林彪予以批判、贬低。然而，对于中国现代历史上这么一位重要的人物，史学界应该摒弃那些带有很大功利目的、带有很大政治安全考虑的官样文章，对林彪在各个历史时期的作用予以深入、全面的研究，揭示那些人为扭曲了的历史原貌，还原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林彪。这



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林彪百年诞辰之际出版这本研究文集的初衷。

多维：有关林彪的评价，最近国内出现不少新的迹象，你能否谈谈关于这方面的状况？这是否意味着包括您在内的很多人多年的呼吁，开始得到官方的某种积极效应？

丁：今年7月，中共人民解放军建军80周年前夕，北京的军事博物馆就解放军发展和国防建设展出了大量历史照片和实物，其中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动向，是三十多年来首次展出林彪的照片，作为十大元帅之一的林彪恢复了他本来应有的地位，展览中不再予以回避或隐匿，在一些介绍文字上也较为客观、中性地予以说明。

据说在军博展览之前在是否正面介绍林彪一事上有一些争议，但毕竟军博是个博物馆，而非文学馆，历史就是历史，人为地予以掩盖或回避只能表现出当政者的心虚和短视。

此外，今年9月24日，在山西灵丘县隆重举办了平型关大捷70周年的纪念活动，纪念活动在平型关大捷纪念馆前举行，由山西省委宣传部和中共大同市委共同主办。省委官员及原八路军一一五师参战部队代表出席了仪式，林彪的铜像首次屹立在纪念馆的将帅广场上。不仅如此，9月28日四平战役纪念馆新馆开馆，时任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四平保卫战、四平攻坚战总指挥林彪蜡像陈列其中。

从这一系列的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当今的中国决策者比以前已经有了一些进步，至少对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期间的林彪予以正面肯定。虽然这仅仅是很小的一步，但是我们仍能看到一个趋势，即被扭曲和掩盖的历史迟早还是会恢复它的本来之面目的。

◇ 林彪是否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多维：您能否介绍一下您编著的《百年林彪》这本书？它在林彪研究领域，有哪些新意或新的特点？

丁：《百年林彪》这本书分为三个大的方面。

第一方面，论述林彪早期的革命生涯，主要涉及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平型关大捷，林彪对八路军抗日战略战术的贡献、林彪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所作的贡献，林彪为何没有在朝鲜战争中领军挂帅，以及近十年来对战争时期林彪的活动和思想的研究综述；

第二方面，主要论述林彪与“文革”的关系，比如彻底揭示了所谓《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出笼经过，推翻了如今大陆党史界的所谓“林彪与江青勾结”的定论，指出该“座谈会纪要”不过就是毛泽东与江青夫妻店的产物，是毛泽东刻意以此抬举江青，使江青迅速介入中共高层政坛，并推进其“文革”大业的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

第三方面，则是进一步深入剖析“林彪事件”的来龙去脉，澄清被中共官方所歪曲的历史，其中几篇重要的文章包括，1970年庐山会议斗争的背景研究，汪东兴在林彪事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林彪是否打算“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所谓林立果主导政变阴谋的“三国四方会议”之真相为何，等等。还有一篇重要的文章揭示和分析了林彪事件中广州军区副政委卜占亚是如何被牵连，而所谓的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又是如何被确认的，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在幕后各扮演了什么角色，而前台的打手张春桥和华国锋又是如何秉承“毛旨”制造的这起冤案。此外，林彪事件中，林彪的贴身警卫李文普在“913事件”中为何“临阵脱逃”，其背后的原因何在。通过这些文章的研究与探讨，人们将会对林彪事件有一个更清晰的认识和

了解。

多维：这几年海外呈现了林彪研究的热潮，你能否对此作些评论和介绍？

丁：的确如您所言，海外这几年就林彪以及林彪事件之研究进入了一个黄金时代。明镜出版社在2004年8月出版了由我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上下册），是对林彪事件研究的重要推进，代表着林彪事件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该书问世催发了林彪研究的热潮，2006年4月，明镜又出版了吴润生的《林彪与文化大革命》一书，同年8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事件完整调查》（上下册），今年5月又出版了舒云女士的《林彪画传》。加上今年10月出版的这部《百年林彪》一书，仅明镜一家出版社，在短短三年内，就出版了五部关于林彪的研究专著。这些书，标志着将林彪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国内，将对于林彪其人其事的评价，从少数知情人和研究者的关注圈子中，引入了广大经历过“文革”的民众的视野，以及没有经历过“文革”、过去对林彪只能简单重复官方“阴谋家”“野心家”定语的年轻人的视野。此外，国内及海外互联网上也出现了大量讨论林彪功罪的帖子，无论这些网友们的观点如何，参与讨论就能启迪人们的思考，就能打破大陆官方钦定的一面之辞。这一点是我们不能忽视的。

◇ 历史岂能划分为“黑白”？

多维：这几年来您一直在思考与探索林彪问题真相，请您就林彪事件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谈谈您的看法。

丁：历史研究不是政治评论，不是简单地下某种政治性定论，做非黑即白的两极性思维。记得三年前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就《重审林彪罪案》一书的演讲会上，金秋教授特别就这个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所谓“定案”“翻案”说法中的这个“案”字，就是误将林彪研究的历史学课题，当成现实政治表态了。我想她的这个观点依然值得大家深入思考。在对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研究中，几百年、几千年都不能说有了什么不可更改的定论，即便是事实经过基本都弄清了、没有什么疑问了，对这一事实经过的评价，还可以人言言殊，再争论几百年、几千年。对林彪其人，也正是如此。怎么能说，毛泽东定下了他的两大罪状、两顶帽子，邓小平说了“要毛泽东还是要林彪”，我们就不能再质疑、再探索了呢？

现在还有不少人喜欢用简单的二分法看待历史，将历史人物分为“好人”或“坏人”，透过政治“偏光镜”来看待一切（邓小平那句要毛还是要林的选择题，就是这种思维最典型的表现），只要涉及到所谓“坏人”的研究，予以客观、公正、不囿于陈说定见的评价，就会招致禁令、围攻，甚至人身侮辱、谩骂，对研究者的动机甚至家世来一通抹黑……不一而足。这其实还是“党文化”泛滥的现象之一。

历史人物和事件，岂能截然划分为“黑白”的？历史应是多维性的，并具有包容性，应该允许不同的观点相互切磋。不能一有不同观点，就扣上“翻案”的帽子。对历史学家来说，历史研究不是定案，不能简单的盖棺论定，而是尽量从不同的角度来研究历史，使其更有血有肉，更具有真实性。

□ 原载《多维时报》2007年11月30日

~~~~~

【人物春秋】

百年回首话林彪

• 丁凯文 •

评价一位历史人物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一位在历史上带有争议的人物更是如此。中国人喜欢用“盖棺论定”一词，这大抵是说，当一位政治人物走入历史后，他的所作所为也被定格，不会再有新的言行表现，那么后人就可根据其人以往的表现给予一份较为客观、中肯的评价。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简单，历史人物的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执政者的好恶，并被他们所操纵，当权者们根据自己的政治利益和需要随意褒贬历史人物，甚至歪曲历史事实与真相，以达到维护、巩固当权者的地位的目的。正因为此，历史人物的形象往往会被人为地拔高或贬低。由此我们也常常看到一些被当权者“论定”了的人物，日后却被重新评论，一些被当权者定性为“正面”的人物，时过境迁后却被打倒，而一些被当权者定性为“反面”的人物，也不意味着永远翻身无望，历史上颇有一些被当权者定罪甚至杀害的重要人物，若干时日后被平反昭雪，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本书的主人公——林彪，恰恰就是这样一位虽然被现在中共当权者“盖棺”但却未被史家“论定”的历史人物。

林彪在中国历史上的是非功过并非可用几句简单的话即可“论定”，我们不妨再简单回顾一下林彪的一生。

早年的林彪生于内忧外患的中国，其时国内军阀混战，国外列强环伺，政治黑暗，民不聊生。中国的出路在哪里？中国还有没有光明和前途？这是那一代国人所面临的严峻问题，救亡图存成为那个时代的主旋律。梁启超先生就曾撰写《中国不亡论》，大声疾呼中国决不会亡国的。多少中国的仁人志士将目光投向西方，投向苏俄，认为只有向西方向苏俄等先进国家学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才能变法图强，才能抵御外辱，救国家于危难之间。于是，就有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就有了孙中山先生的“以俄为师”。在这种大气候下林彪于1925年只身来到广州，投笔从戎，考入黄埔军校，这时的林彪仅仅18岁。

1926年北伐军起，在“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声中，林彪加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第三连任见习排长，参加了著名的北伐战争。随着国共分裂，1927年8月1日共产党发动了南昌起义，林彪随与起义部队上了井冈山，开始了自己崭新的人生经历。国共内战锻炼了林彪，给了这个乡间青年充分展示其军事才华的巨大空间。1929年春，年仅22岁的林彪出任红四军主力第一纵队司令，1930年出任红四军军长，1932年出任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在中央苏区，历经了五次反围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辉煌的战绩。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不得不开始了“长征”，长征途中林彪过关斩将，在血战湘江、攻克遵义、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攻克腊子口等一系列的浴血奋战中，林彪为中共的生存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自己赢得了常胜将军的美名。

自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三省以后，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步步加深，中华民族陷入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中国掀起了全面抗战的热潮。林彪率领的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歼敌一千余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此次战斗的胜利不仅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而且极大的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日的信心，林彪更成为抗日名将，抗日英雄。后来林彪虽被友军阎锡山部误伤，赴苏联疗养，未能再参与日后的对日作战，但林彪从苏联养伤回国后依然积极参与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作为毛泽东的代表和中共代表团的成员，林彪在重庆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要员们进行了深入和广泛的会谈。不仅如此，林彪还与美国驻中国的外交官进行了接触，向美国友人介绍了中共的抗战主张，传达了中共方面要求国民党放松对中共的封锁以及美国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使共产党也能得到一定比例的美国对华援助等等，并促成了美军观察组对延安的访问。可以说，林彪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1945年在美苏两大盟国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帝国主义不得不宣告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了全面胜利。然而继之而来的却是国共两党的全面内战。作为中共方面的战将，林彪亲赴东北战场，带出了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并充分发挥了他的军事天才，从东北的白山黑水到京津要地，从渡江战役到攻克海南岛，林彪率领的中共第四野战军，横扫了大半个中国，为中共的建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作为一个职业军人，林彪的战绩无人可出其右。

中共建国之后，林彪深受伤病之苦，很长一段时间处于修养的状态，并远离政治核心，这一状况一直持续到1956年的八大前后。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这是毛泽东首次确立了林彪在中共党内举足轻重的领导地位，尽管这并非是林彪自己争取得来的。1959年在毛泽东的主导下，林彪接替彭德怀出任国防部长和军委第一副主席，主管人民解放军的工作。众所周知，由于毛泽东于建国之后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的乌托邦空想和专制皇权的泛滥，中国的发展历经了巨大的曲折，一系列的政治运动更造成中国政治生活的扭曲，从反右到大跃进，从庐山会议的打倒彭德怀“军事俱乐部”到引发全国性的大饥荒，毛泽东的神话逐渐开始褪色。而林彪领导下的解放军则喊出了突出政治的口号，全军上下掀起了学毛著的热潮，“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等应运而生，及时地修补了毛泽东神像上出现的裂痕。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林彪发表了一篇支持毛泽东的讲话。林彪虽然看到了毛泽东的失误，但是在毛泽东与刘少奇关系紧张和中央上层出现裂痕之际，林彪在“忠君”和“党内大局”的面前选边站在了毛泽东的一侧。事实上，从1959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作为政治家开始一步步卷入风云变幻、波诡云谲的政治斗争漩涡。

林彪一生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卷入文革的漩涡，虽然林彪被动地被毛泽东拉上了文革的战车，但是正是由于林彪的腾飞伴随着文革的兴起，以及文革爆发前后林彪对毛泽东的吹捧和支持，致使文革运动如燎原之火烧遍全国。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给中国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造成了深远的影响，林彪参与其中当然要负相当的责任。然而林彪责任是否如官方所言，林彪成立了反革命集团要篡党夺权呢？事实显然并非如此。文革当中一切重大的方针决策，每一项战略部署都是毛泽东一人决定，毛泽东从未找过林彪这个“副统帅”协商、讨论，毛泽东只是在作了决定后通知一下林彪，有时甚至连通知都免了。毛泽东对林彪的唯一要求就是替毛掌管好军队，为毛泽东的文革大业保驾护航。林彪相对于周恩来在文革中所起的实际作用要小得多。因此，林彪与文革开始时众多的中共元老是一样的，他们在毛泽东的威权下，都不得不积极表态参与支持这场运动，所不同的是林彪被毛泽东硬拉上了“副统帅”的宝座，林彪以毛泽东接班人的身分发表的讲话和指示对文革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其风光程度远非其他中共元老所能比拟，因而也更多地为人所诟病。

考察林彪的一生，林彪当年也是一个热血青年，怀着一腔救国救民的激情和愿望，投身军旅，希望找到一条使中国摆脱贫穷和积弱的道路，使中国走向繁荣和富强。林彪与当年共产党中很多先贤一样，为了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不计个人安危，为了革命事业置生死于度外。在长期的军旅生涯中，林彪曾身先士卒，冲锋陷阵，身上亦曾多处负伤，这在中共军队高层次指挥官里也是不多的。虽然中共后来的发展从根本上背离了自己当初的理想，但是我们却不能否认当初的中共，上上下下充满了理想和朝气，中共也的确网罗了一大批优秀的人才，林彪当然是这群人之中的佼佼者。1949年中共建国后，中国人民望治心切，对毛泽东与中共寄予厚望，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一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振奋了多少海内外炎黄子孙的心。然而胜利之后的毛泽东却迅速地走向了自己的反面。一次次政治运动由小到大，整人由少到多，斗争由党外到党内，再由下层到高层，从打倒“高饶反党联盟”到“反右运动”，从打倒“彭德怀反党集团”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与中共彻底背离了他们当初向国民党争取民主、争取

自由的崇高理想，其专制独裁的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乃至文革运动登峰造极，让天下生灵涂炭。林彪作为中共的主要领导人难道可以以身幸免吗？

林彪事实上所表现出来的更多的乃是一个军事家，而非政治家。搅入文革浑水毕竟只占了林彪一生当中短短的五年时间，林彪影响力基本上也只在军队内部，并未进入政府部门，也未进入党务部门。林彪以军人的身分跻身最高领导层，实非林彪个人能力所能承担，以毛泽东翻云覆雨的性格和不择手段，林彪骑虎难下，也种下了林彪后来倒台的种子。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以其军事方面的奇才可彪炳千古，但是作为政治家的林彪却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以中国传统史学观点来看待林彪，林彪的命运实际上并未跳出中国传统的政治格局。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共这一政权的本质特性。中共政权虽有现代国家的共和、民主之名，但实质上仍是中国传统皇权专制体制。在这种专制体制下，毛泽东居于绝对主导地位，是中国皇权政治体系在现代社会的翻版，毛之晚年尤甚，一任外戚、内侍弄权，江青及其党羽犹如汉初及唐初之吕氏、武氏一族，康生、汪东兴等犹如汉末之十常侍及明末之魏忠贤。而林彪之于毛泽东则与中国传统皇权体制下的君臣关系毫无二致。

如果我们以中国历史上君臣关系加以比较的话，毛泽东对林彪与汉高祖刘邦对韩信之关系多有仿佛。在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韩信襄助刘邦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汉朝江山的建立居功厥伟，以致刘邦自己在与群臣探讨楚汉胜败之原因时说“连百万之军，战必胜，功必取，吾不如韩信。”（见《史记》之《淮阴侯列传》，以下引文同）刘邦区区一句话即点明了韩信在楚汉天下之争中所起的决定性作用。然韩信之结局却异常惨烈。汉初时韩信被封为楚王，但刘邦对这些异姓王并不放心，这时有人不失时机地向刘邦打小报告，《史记》记载说，“汉六年，人有上书告楚王信反”，刘邦则借机“天子巡狩会诸侯”而“游云梦”，从而一举擒拿韩信，刘邦对韩信宣布的罪名是“人告公反”。这其实就是典型的欲加之罪而无需确凿的证据。二千年后的毛泽东对林彪采取了几乎与刘邦一模一样的手段，在1971年8月的“南巡”途中，毛泽东指责林彪“想当国家主席”，性质属“篡党夺权”，乃“谋反”是也。毛泽东与刘邦唯一不同之处在于，刘邦当时还是“有人”上书举报韩信谋反，而毛泽东干脆以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身分来了个“毛告林反”，正统帅“举报”副统帅要“谋反”，毛泽东的“举报”当然无需什么证据，只要“金口玉言”即可，所谓林彪“谋反”的证据可以在日后制造出来，为时未晚也。显然，以手段的狠辣方面而言，毛泽东比刘邦还要更胜一筹。林彪为了共产党的天下立下了不世之功，较之韩信对汉家天下的确立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其结局竟然与韩信何其相似乃尔。

如果我们再细审毛泽东所建立的“新中国”和林彪所起的作用，林彪之功绩也只是对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新朝”有实际的意义，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毛泽东建立的不过就是历朝历代以降又一个“朝廷”而已，其实际上的进步意义甚至还不如孙中山之推翻满清王朝，这一“新朝”并未将中共政权体制转化成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政体，其专制独裁的程度令当年被推翻的国民党也瞠乎其右。换句话说，林彪为中共政权所立下的丰功伟绩也许并不完全为历史所认可。历史无可置疑地证明，毛泽东和中共的胜利却是中国人民苦难的又一次轮回的开始，及至中共建国近四十年后才开始有所醒悟，不宁晚乎？因此，林彪个人的悲剧亦源于此也。

国人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以传统的观点来看，端视其人对人民是否有所“德政”，即“恩泽万民”。历史上倍受人民尊崇的人物，在中国的小说、戏剧中常有出现者如狄仁杰、包拯、况钟、海瑞等，皆属清官，他们的身后也颇得人民的怀念。文革结束后，大陆在贬毛的同时，掀起了扬周的热潮，全国上下对周恩来的评价甚高。但是以周恩来在文革当中的所作所为，周恩来之助纣为虐实比林彪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作用，但对二者之评价何以有此天壤之别？撇开官方的大力宣传和舆论导向的作用，周恩来确有关心民间疾苦的一面，在紧跟毛泽东“抓革命”的同时，还不忘“促生产”这个事涉国计民生之要事，并在自己有生之年提出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大业。即使现在很多人对周恩来其人有更多、更深刻的认识，但是仍然不妨碍人

们对周恩来的怀念，而这点恰恰是林彪较为缺乏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林彪对国计民生漠不关心，如果我们细审林彪早年发表的言论和文革中的一些讲话，林彪是极为重视经济建设的。即使在文革期间，林彪在号召紧跟毛泽东的战略部署时，亦每每强调不可忽视生产建设。那个被毛泽东否定的陈伯达起草的九大政治报告就有林彪的影子，它提出了要发展生产力将中国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周恩来的四届人大报告所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其实也是林彪这一思想的延续。只不过林彪并未主导政府机构和国家建设，林彪的思想不为广大世人所知罢了。

国内对现代历史人物的研究，以目前的情势来看，依然无法跳出党文化的藩篱和束缚。正面人物依旧都是“高大全”，而反面人物则一无是处，国内史家敢于越雷池者少而又少，这实在是中国史学界的悲哀。然而这种情形也并非一成不变，以对毛泽东的研究为例，一方面中共政权要维护自己的统治，不得不继续高举毛泽东的旗帜，但另一方面却将毛氏思想改头换面，同时也不讳言毛泽东晚年的某些错误，然则对毛氏错误的批判却严格限制在党中央允许的范畴之内，不仅在许多重大历史事件上仍然为毛泽东强加掩饰，而且将这些罪恶分摊到林彪与“四人帮”的头上。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样一种客观趋势，即对毛泽东的批判日益增多，毛氏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晰，毛泽东的形象不仅摇摇欲坠，毛泽东在国人心中的地位更是每况愈下，随着越来越多的史料的披露，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一趋势还会继续发展下去。史学界对林彪的评论也逐渐有所变化，对林彪早年革命经历的描述已经不太忌讳，当然在正面评价林彪功绩时依然不忘留个尾巴。事实上，林彪最富争议之点还在文革一事。笔者认为，对林彪的评论离不开对毛泽东的评论，惟有将毛泽东在文革当中的责任说清楚，将历史的史实一一澄清，才能还原一个真实的林彪，而非一个被脸谱化、妖魔化的林彪。

最后还想就林彪的出走说几句。不少论者对于林彪的出走颇不以为然，谓之曰：不顾“革命气节”和“民族大义”，乃至“叛国投敌”云云，因此，林彪的出走当属“卖国”。如此论点大可值得商榷。所谓“革命气节”是针对中共自己而言，而“民族大义”则是针对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而言。毛泽东的文革运动到了彼时彼地早已天怒人怨、众叛亲离，如此“气节”有何保存之价值和意义？放弃了如此的“气节”又有何可惜以致值得大张挞伐呢？至于什么是人民的利益和国家利益，这些深受党化教育的人恐怕至今也还是没有搞清楚。就文革浩劫而言，打击文革中的极左派势力，终结这一动乱就符合人民和国家的根本利益，这已经为历史所证明。林彪敢于在庐山会议上，在毛泽东在世时出手打击文革极左派张春桥，堪称壮举，林彪虽然未能成功，但是林彪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令人敬佩。“9 1 3 事件”从表面上看，林彪的确身死蒙古大漠，但是林彪在自己最不利的情况下，在毛泽东意想不到之处打乱了毛泽东的整人部署，使毛泽东的神话破灭，使毛氏文革走入穷途末路。“9 1 3 事件”后毛泽东不得不检讨文革策略，解放一大批老干部，重新起用邓小平等人，由此埋下了文革彻底翻盘的种子。怎么能说林彪对此没有贡献呢？这正是林彪大智大勇之表现，难道林彪像刘少奇、彭德怀一样被整死在黑屋子里就符合“民族大义”？就符合人民利益和国家利益吗？这些人还可强辩说，林彪出走到了外国就是“叛国投敌”。殊不知在现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里，当人们面对无可抗拒的政治迫害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至黎民百姓，人人都有逃亡的权力，这种例子不胜枚举，逃亡不等于“叛国”，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林彪的出走即属逃亡避祸，只不过，林彪的出走在中共自己看来实属大逆不道。时至今日，人们的思维是否也该与时俱进，有所醒悟呢？

百年林彪，林彪百年，林彪这一研究课题还会继续深入下去，愿本书的出版为世人打开一扇重新认识林彪的窗口，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的林彪。

□ 此文为《百年林彪》前言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

【回首人生】

## 我和徐景贤

• 沙叶新 •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他在上海生活 74 年，我在上海也生活了 50 年。同在一座城市，都是动笔杆的，还都写过剧本，还互知其名，但在 4 年以前我们从未见过面。

在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时，我根本没想到要写他；前不久他去世了，我却很想写写他。

他是徐景贤！

### ◇ 名列张姚之后的“徐老三”

如今三、四十岁以下的人，几乎很少知道他是何许人了。可在“文革”十年，他却是大大的风云人物，他是上海“文革”重要的起始人、当事人，是上海“文革”核心的策划者、操纵者。当年在上海滩，谁个不知他是声名显赫的市委书记徐景贤？哪个不晓他是名列张春桥、姚文元之后的“徐老三”！但他不像张那样阴沉乖张，也不像姚那样纵笔招摇。很多人说，张像狗头军师，姚像刀笔师爷，徐则更像个黄门秀才，印象并不恶。徐体貌修长白皙，也让枯瘦的张、肥矮的姚，相形见绌。徐是当年许多左倾妇女的偶像。时至今日，还有一些半老的徐娘提起当年的“徐郎”仍然津津乐道，说他作报告从不用稿，说起话来井井有条……一种钦慕之情，溢于言表。

每当听到这种私下的暧昧的言说，总令我感慨万千。“文革”已经奄忽 40 年，那么惨痛深刻的政治血迹，却逐渐淡去；而对政治人物的外在印象，倒经久不忘。历史就如千面少女，任人打扮；历史也像癩病患者，极易错乱。前代历史的真容便是这样诡秘地不断地“变脸”，甚至是销声匿迹地隐藏在当今历史的背面，或者是完全被消融，或者是彻底被整容。当然这不是人民所书写的历史，而是权势者所炮制的历史。

2002 年 12 月 15 日，原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老演员钱枫先生打电话给我，说不久前他在医院遇到徐景贤，只见他老多了，一无当年的风采。两人说话间，提到我，徐景贤请钱枫代他向我致意，并说文革中为《边疆新苗》之事对我的批判是错误的，他要向我道歉。

我很惊讶，也有一丝感动。

《边疆新苗》是“文革”中我奉命所写的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话剧。这个戏本是“遵命文学”，已经很政治，很革命，很教条，万万没想到也会挨批！当时正处“批林批孔”的党内斗争高潮，文艺界也正在批判所谓的“文艺黑线”回潮，文化部长于会泳在上海多次点名《边疆新苗》，说它有小资的“花花草草”，有大资的噱头笑料，违反了社会主义的创作目标。于是 1974 年 3 月 21 日上午，在我们剧院召开全市文艺院团对《边疆新苗》的现场批判大会；而这天正是我妻子在医院临产，我不能请假陪伴，更不能透露我将接受批判。

我在剧院挨批，妻子在医院待产，我的心情之忧、之恶可想而知……

#### ◇ 对被错批错斗的人都道过歉

我在“文革”初期也挨过批、挨过斗，挂牌下跪，羞辱难当，但也没有这次对我的批判让我刻骨铭心，终身难忘，批得我差点神经失常。

提出对我批判的是身为文化部长的于会泳，而身为市委书记的徐景贤并未下达过这样指示。不久我还听说，于会泳、徐景贤之间，在对待《边疆新苗》的态度以及如何修改的问题上也有分歧，徐景贤是比较倾向我们的。

挨批以后，我们剧组再次“深入生活”，第三次前往黑龙江知青点采访，于是又不得不无穷无尽的讨论，无穷无尽的修改，在这出破戏身上继续浪费精力和生命。

1975年，政治形势更加动荡，突然之间，11月2号徐景贤打电话给当时的文化局党委书记说：“《边疆新苗》还是不错的，你们将老本子和新本子都看看，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就尽快演出。”还说：“去年对这个戏解剖有无过头的地方，也请研究研究。”

于会泳说《边疆新苗》“问题严重”，徐景贤说这个戏“还是不错的”；于说对这出戏“批判”，徐说是“解剖”。二人明显不一致。可是好梦不长，时隔仅两个多月，1976年1月13日，又传达于会泳的指示，说：“去年七八九十月，文艺界的翻案风极为猖狂，现在要反击，要炮轰，要搞运动！”于会泳说的“翻案风”是否包括徐景贤对《边疆新苗》的“翻案”呢？这令我们整个剧组极为不安。又过了不久，文化局又传达徐景贤对我的批示，大意说：“沙叶新年富力强，有写作能力，应该为他提供条件，深入生活，写出更好的剧本。”啊？是吗？我当时真有点受宠若惊！

于会泳给我的感觉总是阴风习习，徐景贤则是暖风徐来——这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感觉。至于他二人是否有本质区别，我不敢说，但毕竟有所不同。任何政治组织，任何利益集体，哪怕宣过誓、拜过把、歃过血、结过盟，都会因时势的衍变，总是既有忠诚，也有背叛；既有团结，也有分裂；既有和谐，也有争斗；既有觉悟，也有顽固；何况单独的个人？于会泳至死不认罪，最后服毒自杀。徐景贤认罪服罪，甚至连无直接责任的罪错，如《边疆新苗》之事，也要道歉，你能说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案犯，就没区别？况且他不只是对我一人道歉，对其他被错批错斗的人也都道过歉。

#### ◇ 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

所以当徐景贤出狱之后，托人带话向我问好致歉，我是接受的。半年后，2003年“五一”长假的第一天，徐景贤打电话来，要来我家看我。我连忙说你岁数比我大，还是我来看你。5月2号上午9时45分，我按约准时来到他家后门口。我站在楼下，只见徐景贤下楼来了，佝偻着，横着身子，扶着墙壁，忙不迭地来接我。我第一个印象是他真的老了，但没有想到他老弱得如此厉害。这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文革”权贵徐景贤？难以置信！公道世间唯白发，贵人头上不曾饶，他两鬓有霜了……

徐景贤又艰难地爬上楼，在前面为我引路，还不断地提醒我：“楼梯窄，你要当心。这弄堂里的房子，是1925年造的，比我年龄还大，老了，旧了。不过也正适合我住，我也老了，旧了。”我不知道怎么应答，只觉得有点凄楚。但我相信他不是牢骚；他是笑着说的，还带着点幽默语气。

上得楼来，才知道这一幢楼住了好几户人家，厨房是共用的，过道也是共用的，显得逼仄



拥挤。他领我去他的书房，也很小，是利用天井的上空搭建出来的，约15平房，有书橱、书桌、沙发等最简单的家具，也都老了，也都旧了。

还没落座，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端来茶水招呼。徐景贤介绍说，解放初她曾任夏衍的第一任秘书。爱屋及乌，令我肃然起敬。她很客气，话不多，连连说：“请坐、请坐！”

就这样，我和徐景贤，一个“文革”受害者，一个“文革”当政者，面对面地坐在一起了。以往他在台上，我在台下；他在天上，我在地下。这是我们第一次在同一个平面上平等相见，我们握手，我们问好，他敬茶，我送礼……

他诚恳地对我表示歉意，说他当时随便一句话都可能对我造成意想不到的伤害。他请求我原谅。

我含含糊糊地说：“这些事情都是在特定历史时期造成的，如今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回顾以往的种种，不应该完全由个人负责。”

他说：“不，我是有责任的。我应该向你道歉。”

难道真的是相逢一笑泯恩仇？我们之间真有怨仇吗？怨仇只是在我们之间吗？如果说罪恶不应由他一人负责，那谁该负全责呢？债有主，冤有头。主是他吗？头是他吗？问苍茫大地，谁主谁头？一时思绪飘忽而紊乱，脑海里立即涌现天安门城楼那挥动的巨手……

◇ 回忆录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接着，徐景贤向我叙说“四人帮”倒台之后他的经历：被捕、审讯、交代、关押，判刑。他判了有期徒刑18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我问：“18年？你怎么和姚文元的刑期一样长！”

他说：“也许是我坦白交代的比较好。最早他们说，对我免于刑事处分；后来北京公审‘四人帮’，又说要判我的刑了。对我的定性也有改变，最早定我为‘四人帮’的余党，后来定为死党，所以判了18年。还有一个原因是马天水有精神病，不能判刑。王秀珍工人出身，资历浅，也不宜重判。上海就我们这几个头头，总要有一个判得重一些，就把我顶上去了。”

我不知道徐景贤说的判刑经过是否实情，但他在叙述这一经过时，毫无一点怨言倒是真的。语气平静，说的像是别人的事。

徐景贤在狱中身体不好，他的夫人葛蕴芳给邓颖超写信，邓有批示，让上海酌情处理。上海便以“特种原因”为由提前三年于1992年6月让他保外就医，1995年刑满，1999年恢复公民权利。

他说：“漫长的狱中生活对我有个好处，就是可以冷静地思考好多问题，思前想后，反复追问，认真洗脑，终于让一个比较明白的脑袋长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了。我以前就是你一篇文章里说的那种‘执左道以乱政’的人，但我曾经是个追求进步、忠于人民的人呀，怎么会成为罪人了呢？我不断反思，想弄个明白，就想写本回忆录，想把我的经历和反思写下来。再不写，没人写了。张春桥和姚文元是不可能写的。张春桥并没死，今年85岁，他的儿子和我有些往来，我可以从他儿子那里知道一些他的情况。他在狱中连话都不说，审判他的时候也不说，怎么会

写回忆录？外界又传道说姚文元写了回忆录，也是谣言。他的秘书我很熟，姚文元让他告诉我，他没写回忆录，也没打算写。王秀珍呢？不是动笔杆子的人，写不来。只有我写了。我写还有个有利的条件，就是我和中央一层的毛、周还有王洪文都有接触。中间这一层，我本人就身在其中。下面的这些人，陈阿大、‘四大金刚’，也很熟悉。所以如今只剩下我可以写写上海的‘文革’十年了。我抱定宗旨，只说事实，不说观点。我只说我亲身经历过的事情，让读者和专家去评说。”

2003年底，徐景贤的回忆录《十年一梦》（图为封面）终于在香港出版，第二年的春天，他送了我一本。我告诉他外界对他的回忆录的总体反映较好，说是信史，但也有批评，说他反思不深，也没对自己进行批判。

他说：“不深，是可能的，我现在只有这样的认识水平，只能认识到这样的程度，就这样写了。至于自我批判，我在狱中写检查交代的时候写了无数遍，那是给公安局、给上面看的，读者也许不感兴趣。我只说事实，不说观点。”

其实他的回忆录也有观点，这便是“‘文革’是灾难，要彻底否定。”这是他叙述所有事实的核心，这也是这本回忆录的价值所在。

#### ◇ 何以重新赢得尊重？

初次见面，徐景贤谈兴甚浓，在晤谈中，他还主动说起一位风头人物的“文革”历史所引起的诸多争议。

徐景贤说：“这个人我应该最有发言权，写作组是归我管的，我知道。他当然是写作组的，是‘石一歌’的。他总是想掩饰，越掩饰，人家就越要揭露。他还带记者去找审查过他的负责人作伪证。人家说他在‘文革’中没大问题，对呀，他是没大问题呀，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我，才算是大问题。没大问题不等于你没出问题呀，文革中，你写了那么多文章，很多是署名的，真名实姓，白纸黑字，没问题吗？他和记者篡改人家的话，把没大问题篡改成没问题，这就不好了。这个负责人提出强烈抗议，他们又不得不在刊物上更正。弄巧成拙，反而越发暴露了他的‘文革’历史。何必呢？实事求是嘛！不过，我要为他说一句公道话，有人说他是张姚的红人，那是高看了他，是他自己吹出来的吧？他连我这一级的红人都挨不上，最多是朱永嘉他们看中他罢了。听说他在香港发表回忆，老骂别人，掩饰自己，这就不好了。”

这次见面之后，6月19日，他还给我来了一封信，信尾说：“另外，附上一篇《“咬”》的报道，给你休闲时看看。”所谓“咬”，就是“咬”那位风头人物的，徐景贤特地剪下寄来，可见他对此事的关注，这也正表明他对自己“文革”历史的态度，不掩饰，实事求是。

只要对自己的历史能够持有这样公正的态度，那么历史也会将公正归还给他。不论你有多大罪恶，历史既会让你承担你应该承担的罪责，也会给你很多机会让你从坦诚的反省中站立起来，重新赢得尊重。

徐景贤10月31日下午4时在家中因心脏病突发而去世，11月6日下午2时在中山医院举行遗体捐赠仪式。此前我接到徐景贤家属的讣告，我表示我要向徐景贤遗体告别。11月6日中午，在我出发前居然有关方面给我打来电话表示关注，我真的很生气！我说：“徐景贤虽然曾经是罪犯，但18年的监狱已经对他有过惩处，如今他是享有合法权益的公民，人已去世，我为何不能前去吊唁？我非去不可！”

◇ 徐景贤遗体告别仪式花篮花圈摆满一屋

“文革”博物馆不让建立，“文革”研讨会议不让举行，如今连“文革”人物去世竟然也不让凭吊，这太过分了，太绝情无理了！凡此种种，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逃避日后的清算，要让所有的中国人，以及世代代子子孙孙，忘掉“文革”，忘掉浩劫，忘掉罪责，忘掉祸首！不，我们不能忘记，世代代子子孙孙都不能忘记！

徐景贤的追悼会我毅然决然地去了。为了探视这个历史人物最后一眼，为了向他已献出的遗体深鞠一躬，更为了不忘记“文革”这段给千百万中国人造成极大灾难的历史！

参加告别仪式的人很多，花篮花圈摆满一屋，我想仅就捐献遗体一事，他也应该得到人们的尊重。看看八宝山，看看纪念堂，或存骨灰，或留尸骨，能有几人能像徐景贤一样呢？

挽联上写着：“用权不为私有错善反思，人品最真诚勤奋过一生。”这基本上可以概括他的一生。

“文革”十年间，他身居要职，但他一人得道，家人并未就此升天，确如挽联所言“用权不为私”。亲戚中的孩子包括他自己唯一的亲弟在外地插队多年，他也没让他们调回上海。外甥中有人想参军，他不给他们开后门。他父母单独住在老旧的石库门内数十年，没煤卫设施，很想改善住房条件，他也拒绝二老的要求，他说：“等到周围邻居家家家户户都安装煤卫之后一起解决，我们不能特殊。”对比如今的吏治官风，对比陈良宇的所作所为，真有云泥之别！

“文革”如今在中国大陆是一个敏感的话题，是禁区，巴金生前提出要建立“文革”纪念馆，至今都无法实现，何来研究，何来反思！而徐景贤触及禁区，进行反思，反思而成的回忆录在大陆竟无法出版，只得在香港问世；出版者也因此遭到鞠讼。以此观之，这是一向愚忠的徐景贤的首次出轨，他超越了禁区，也超越了自己，正如他自己所说“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了”。他愚忠的时候，犯了大错；他不愚不忠了，反而做了一件好事，至少是应该做的、有意义的事。

可惜的是，徐景贤的反思，仅仅局限过去，在我和他仅有的几次晤谈中，他从未涉及对最近三十年政局的看法，更未谈论现在他对他前半生一直忠于的党、一直忠于的制度的见解。我想“脑袋长在自己的肩膀上”之后的徐景贤，也许会有和以前不尽相同的观点。我真想听听，可惜他全带走了……

2007.11.26 上海善作剧楼

□ 原载《动向》杂志2007年12月号

~~~~~

【回首文革】

冯友兰忆江青

• 冯友兰 •

1973年夏天，谢静宜到我家里来，说江青派她来问候我。

问候完了，就建议我写封信感谢，还不断有人来催。我当时认为，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

是代表毛主席的，问候我是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是毛主席、党中央对老年知识分子的关怀。

我就照这个意思写了一封信。信是写给江青的，但表示感谢毛主席、党中央。这封信交给了校党委。

1973年这年秋天，有一天，校党委政工组叫我去清华开会，会议由迟群、谢静宜主持，说是要组织力量批林批孔，成立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谢静宜拿了一本赵纪彬的《孔子诛少正卯考》给我，说：“江青要你看看。不久还要找你谈谈。”后来并没有找我谈。当时宋柏年（北大党委政工组干部）对我说：“你不必天天到，当个顾问吧。”我当时的理解是，我只是挂个名，不一定有实际工作。因为宋柏年在此以前曾到过我家里，问我一些成语、典故的意义和出处，叫我帮他查书，大概还是要我帮着做这一类的事吧。

他们有事才来叫我，所以并不经常去。我去参加过一些批林稿子的讨论，查过一些成语、典故的出处，例如“天马行空”最初见于何书，少正卯的“少正”二字是官名还是姓氏，“忠孝节义”四字连用最早见于何书，等等。有时也推敲一些古书，例如《易·系辞》的“尺蠖之屈，以求伸也”的意义。

1975年他们曾来找我去看长沙出土的帛书《十大经》。他们有一个读书会，叫我去讲过一两次《韩非子》。他们写的有些关于批孔的稿子，有时也送我一份打印本。我当时集中精力修改《中国哲学史新编》，对于这些稿子，只大略翻一下，就放在一边。《论孔丘其人》初稿打印本也给我看过，我当时只认为是一篇考据文章，作为考据看，也算是用了些功夫，不过作为批孔丘，并没有很大意义。

1974年6月12日，大批判组通知我进城开会。先到大批判组聚齐上车，也没有说什么会。车开到人民大会堂，进去一看，到的是北大、清华和中央党校的批林批孔班子。坐下以后，有人悄悄地对我说：“等会儿领导同志来了，你说话别罗嗦。”我不知道他打这个招呼是什么意思，只觉得这次会是不寻常。江青等人和一些领导同志进来了，走过每个人面前时都握手。江青走过我面前时说：“本来想去看你，因为穷忙，没有去。”王洪文首先发言，说：“你们的工作有成绩。”以后进入漫谈。江青发言最多，也最拉杂。归结起来，无非是说，凡是历史上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是法家，法家的特点是主张统一，反对分裂；主张抗战，反对投降。周亚夫打七国是阶级斗争，也是儒法斗争。漫谈将结束，江青又请叶剑英同志作总结。

叶剑英同志也讲了一段，大意是说，要好好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会照当时的情形看，是江青主持的。她是这个会的主持人，也是主要发言人。因此我得到的印象是，江青是代表党中央向参加会的人布置评法批儒的任务。当时我认为，她的话必有所本，可能是毛主席对研究中国哲学史的指示，领导同志离开会场以后，有人说：“今天政治局的领导同志，除了毛主席周总理以外，都出席了。”我的眼睛不好，也不知道他说的是真是假。到会的人都兴高采烈，看起来他们都信以为真。

江青在要离开会场的时候，说：“我在下面有几个点，最近要下去看看，你们也可以去。”隔了几天，大批判组将我叫去。到那里以后，谢静宜告诉我说，她们要出去一趟，问我的身体能参加不能。我说能参加。当时我想，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我还没有出过北京，有机会下去看看也好。谢静宜说现在就要走，叫我回家拿着日用的东西，一起上火车站。她没有告诉我去干什么。

到了火车站以后，迟群、谢静宜已经先到了。她们让我走进一列“专车”，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问他们，他们也都说不知道上哪儿去，去干什么。上车等了一两个钟头，车还是不开，

我就先睡了。在睡梦中，听见有人说，到了，都下车。下车到站上一看，原来是天津。坐上汽车，到了招待所，这才吃晚饭。吃罢晚饭，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了。有人传话来说，大家都睡吧，有话明天说。第二天早饭以后，传下来了三条禁令：一不准写信，二不准打电话，三不准上街。还说招待所有个小花园，在小花园转转可以，可不能出大门。

我和同来的人到花园转了一圈，江青来了，原来她住在另一个地方，只有迟群、谢静宜我们一起在这里住。天津市文化局局长王曼恬，也跟着江青来了。江青召集去的人开会，开会时她先同王曼恬说：“听说你们要请我们吃饭，不必请了，就算是个聚餐会，大家都出钱，这几个钱我们都还出得起。”她问我：“你的工资多少？”我说：“三百三十五。”她说：“比我的工资还多啦！”她又对王曼恬说：“你看，聚餐费都还出得起吧？”

接着她就拉拉杂杂地谈起来，也没有说这次来有什么任务，来的人有什么工作，只讲她的历史。她说她小的时候念过私塾。在私塾里，学生有错，先生可以用板子打手心。那种板子又大又厚，挨起来可痛呀。可能是她挨过那种板子。后来她到山东大学，跟赵太侔、梁实秋学一点西洋文学。她说，梁实秋谈话很有意思。诸如此类的话，拉拉杂杂地谈了一两个钟头，也没有让别人说话就散会了。下午，在招待所看了一部香港影片。电影还没有看完，我就觉得浑身发冷，打战，发高烧了。我的左腿有一个丹毒的病根子，想必是丹毒又发作了。迟群送我到医院，医生诊断，果然是丹毒急性发作，就住医院。刚进病房，又来通知，换一个条件比较好的医院。在那里一直住到6月底，家里人还不知道。后来有人先回北京，到我家里说了，叔明到天津来把我接回北京。

在医院的时候，医生对我进行了点滴治疗，躺在床上不能动。迟群来说：“一切活动你都不能参加了，你这次到天津，就算参加会而不参加活动。”究竟是什么会，他也没说。后来听医院的人纷纷传说，才知道就在我进医院那几天里开了一个铁路工人主讲的批孔会。说是铁路工人主讲，可是江青讲的话最多。在发言开始以前，会场上宣布说，到会的有某某等人，其中也有我的名字。我这才了解迟群所说的那句话的意思。原来这个会名义上是铁路工人召开的以批儒为目的的会，实际上是江青召开的为自己树碑立传的会。她叫我们这些人去，为的是虚张声势。

我躺在床上，身子不能动，头脑还是清楚的。我以前也看过一些小靳庄的农民诗，我想农民还能写诗批儒，知识分子还不能吗？我就随口作了几首诗，让护士们写下来，越写越多，就成了后来在《光明日报》发表的《咏史》二十五首。

其中有一首的两句是说武则天的：“则天敢于做皇帝，亘古中华一女雄。”在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两句诗最受批判，说是捧江青做皇帝。我当时的思想，是从批儒的观点出发的，我当时认为，武则天做皇帝这一个行为，是和儒家的三纲五伦条条都违反的，若说反儒，她应该算是最彻底的。我不知道江青有做女皇的企图，我之所以不知道，因为我向来不信小道消息，我坐在书房也听不到多少小道消息，我认为小道消息大概都是国内国外的资产阶级编造出来的。我只信报纸上的消息，我对于国内外形势的认识，都是以国内的报纸为凭。

至于有些别的句子，有些人随意解释，例如这组诗的最后一首的最后一句说：“深谢耆年带路人。”这个“耆年带路人”明明指的是毛主席，可是有人竟然说指的是江青，向来说，“诗无达诂”，可以灵活解释，但是灵活也不能灵活到这样的地步。

在我离开天津的时候，我们原来同去的那些人，大部分都已先回北京了。我是由天津卫生局派了一位大夫把我作为病员送回北京的。到了北京以后，紧接着又参加了法家著作注释工作会议。我那时候身体还没有复原，只参加了一些大会，小组会都没有参加，只是作了几首诗，《咏史》那一组诗中有几首是在这个时期写的。

在会议闭会的那一天，当时的政治局又接见了。还是江青讲话最多，她还说，可以在报刊上另开一个专栏，发表对于评法批儒持不同意见的文章。这不过是说说而已，后来并没有实行。接见以后，会议就闭幕了。在闭幕后回北大的路上，我对大批判组的一位负责人李家宽说：“我以为还有个闭幕式哩。”他说：“政治局接见就是最隆重的闭幕式。”

在这个会议上，《光明日报》的编辑找着我，说他们要发表《咏史》那一组诗，我叫他们去问李家宽。李家宽不同意发表，他说：“对于历史上有些人的评价，还没有定论，如果先发表了，如果与将来的定论不同，那就不好办。”《光明日报》同李家宽交涉了好几次，最后拿了一个校样叫我看，并且说：“决定发表了。你再看看。个别的字修改一下可以，句子不能改了。”这个最后的决定是从哪里来的，是什么人作的，他没有说。

除了《咏史》以外，还在我的其他文章中提到我的几首诗。有一首是我生日自寿的五律，起首两句是：“水击三千里，人生二百年。”收尾两句是：“愿奋一支笔，奔走在马前。”开首两句出于毛主席早年的诗句：“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毛主席这首诗虽未正式发表，这两句警句则流传甚广，我暗引了。我这首诗，起首是要学习毛主席对于人生的豪情，收尾是要跟随毛主席继续前进：这个意思首尾一贯，本不费解。所以“奔走在马前”是指在毛主席的马前。可是有人硬说是指江青的马前，其根据是据说江青好骑马，而不管全诗首尾的联系。这显然是误解。

1976年唐山地震，我住在地震棚里，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校党委会派人来叫我起来，说江青来了。我赶紧起来，江青已经到了地震棚的门口。她进入地震棚以后，坐了几分钟，说：“地震还要持续很久，你们都要住地震棚，你能带头，很好。”叔明问她身体可好，她说：“在这个时期，好也得，不好也得。”一边说，一边就起身走了，外边已经聚满了很多人，大家都高呼：“毛主席万岁！”她走了以后，党委会的人叫我写感想，我说等明天早晨再说吧。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就来了，我写了两首诗，其中一首说：

无数英雄战地天，红旗高举到前沿。主席关怀如旭日，万众欢呼胜夜寒。

我当时始终认为，江青是代表毛主席到北大来的，隔了一两天，党委会又派人来说，江青送来了两部电影，在五四广场放映，叫全校的人都去看。我心里想，江青大概是要学报上所说的一个公社领导同志那样，叫社员都去看电影以躲避地震。不过我们这个地震棚也就够安全的了。我对他说，我晚上出去不方便，不去看。第二天，两校大批判组中北大的人来说，江青又来了，叫我们去。坐上车，一直开到清华。原来江青先到了清华，在清华工字厅里边的地震棚里讲话。我进去以后，江青就问：“昨天五四广场的电影，你去看了没有？”我说：“没有去。”她说：“昨天晚上宝坻确实有地震。”当时北大党委的领导已经先在那里，江青说：“你们搭棚子还不是办法。”忘记是迟群还是王连龙说：“那您就下命令怎么办吧，两校的人都在这里，马上执行。”江青又说，她所以没有说看电影是躲地震，因为国务院不是这样说的。江青说完，就站起来走了。我坐的车也离开清华，开到朗润园大批判组。有人从里面出来对司机说：“他不参加。”司机就把我送回燕南园。在清华谈的时候，有些摄影记者照了一些相片，后来学校把它放大张贴出来，这些都是新闻照片，并不是摄影留念之类的相片。

□ 原载《冯友兰自述》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丁凯文（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 获取  
中文文件: [hxwz-info@cnd.org](mailto: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 <http://www.cnd.org/>

---